

# 八桂潮涌 文学扬帆

八桂大地山川奇秀,文脉悠长。这片土地孕育了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更滋养出一支生机勃勃的文学桂军。近年来,广西文学佳作频出、势头强劲。从小说到散文、诗歌,八桂作家扎根大地、书写人民,将民族历史的厚重、时代发展的脉动、家园故土深情熔铸于笔端,勾勒出新时代广西文学的宏阔气象。为呈现广西文学的创作生态与整体风貌,本期特邀三位评论家,从不同视角剖析广西文学的艺术特色与发展路径,以期为八桂文脉的赓续与勃发提供有益借鉴。

——编者

## 流动的乡土,开放的眼界

——对广西中短篇小说的整体印象

□贺绍俊

集中阅读了20余篇广西的中短篇小说,涉及十多位作家,此时要对广西中短篇小说创作做出整体评述,是否显得过于贸然?好在笔者对广西小说创作并非初次接触,以往陆续读过不少作品,且印象颇深。此次集中阅读,正与往日积累的记忆相衔接、相呼应,渐渐勾勒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如此想来,偶作一次“冒失”的概括,或许也未尝不可。

当我试图勾勒这一整体印象时,首先便有意将其引向广西的独特性。我相信,地域性始终是区分不同地域文学最鲜明的标识。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地域文化元素,自然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这些作品所讲述的故事,几乎都与八桂大地紧密相连。广西独特的地域风情,为小说增添了鲜活而浓郁的色调。无论是红水河、北部湾,还是棕榈树、红树林,这些典型的广西风物不仅是故事的背景,更融入了情节的推进之中。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向正经历剧烈变迁的广西城镇与乡村,聚焦于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下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例如翔虹的几篇小说,多取材于家乡的现实生活:《再生稻》讲述村民通过培育再生稻,将因过度采矿而污染的土地改造为良田;《鱼挪活》围绕生态环保前提下如何发展养殖产业展开叙事。这类关乎生态保护、精准扶贫的故事,带有强烈的“在场感”,将读者带入广西的土地肌理之中。王彤羽《醉波浪》宛如一曲骛家文化的绵长吟唱,在咸水歌与“女人船”的意象间弥漫着广西沿海特有的热带气息。李灼热《新酒》和《八度一家人》可视为他驻村八度屯的文学收获,对乡村酿酒过程充满仪式感的书写,仿佛从酒坛中浸润出浓醇的醉意。

在这些小说中,能够看到鲜明的广西地域文化元素,这当然印证了作者的广西身份,但地域性并非他们唯一的标识。不少作品并未凸显显著的广西特征,这恰恰说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地域性在小说创作中的作用正日趋淡化,作家们越来越关注具有全社会普遍意义的议题。因此,广西作家在小说中所呈现的普遍性,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也表明,地域性只是广西作家的一个立足点与出发点。他们扎根于八桂大

我曾多次为《广西文学》的“诗歌双年展”撰写综述,对广西诗歌的发展状况较为熟悉。若以刘春、黄芳、陆辉艳、黄土路、牛依河等诗人近期的诗集作为观察切口,或能更深入、真切地把握广西诗歌的现状与特质。

刘春是在诗歌创作与研究领域均取得突出成绩的代表性诗人。无论是他早年参与创办广西民刊《自行车》,还是后来创建网站“扬子鳄”以及编选《70后诗歌档案》,其诗歌写作、批评与相关编辑工作,都生动呈现出“70后”一代人的精神历程、成长轨迹与社会际遇。由于早年在桂北乡村的生活经历,刘春早期诗歌中难免带有一种源自地方性经验的焦虑。在诗集《两种故乡》的第三辑中,他以“歧路村”为象征,将过往的乡村记忆、土地伦理、家族命运与青春往事,转化为如胎记般伴随一生的精神印记。“让我起立向少年时代的我致敬/那颗冲动又随时随地为真理敞开的心/如此孤独,又充满感激”(《怀念》)。在城市化的遮蔽下,刘春不得不以略带尴尬的姿态面对并试图纾解这种焦虑,也因此身心深处承载着“两种故乡”的纠葛。近年来,刘春逐渐将目光投向日常场景与细微事物,透过对他者与自我命运的洞察,持续推动自身的诗歌写作。他甚至能够“于无声处听惊雷”,在平静的表象下触及深处的震撼。同时,其诗中的精神面貌、思想张力与包容空间日益开阔,一种关乎命运共同体的诗歌意识正在形成。例如《风吹大海》《微茫之光》等作品,在具象与虚无、对话与独白的交错中,既关乎个体命运,也指向整体性的生存境遇。而组诗《词不达意》则将现代经验的微妙触角探入古典诗词的空间,在今古对话与语言再造中,展现出汉语的魅力以及现代诗歌差异化表达的可能。

黄芳是“70后”诗人中较早崭露头角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位。与同时代许多女性诗人相似,她曾在诗歌中反复书写女性的身份、经验与意识,并通过理解、“扮演”乃至重构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形象,试图抵达“永恒的女性”之境。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的一生仿佛都在准备、创作并修改一幅终极意义上的自画像,而诗歌正承担了自白、祷词、慰藉与白日梦的功能。近年来,黄芳的诗歌愈发显露出一一种沉潜的力量。她的自白、自省、对话、协商与追问,皆附着于具体的物象与内心的图景之中。在《黄昏里》等作品中,随着“中年经验”的来临,她更加专注于日常的生存现场,以及其中无法回避的疾病与死亡叙事。在记忆与现实交织的视野里,她将普通人的命运从斑驳的阴影与黑暗中,重新带回文字的阳光下。黄芳总能于现实与想象之间找到微妙而精准的连接点,在细节与幽微的场景中激活活象的闪电,引发低沉的雷鸣,并在看似寻常的表象背

后,展开戏剧化的灵魂分身。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诗歌在静水流深中依然葆有力道、张力与锐利,“父母赐予的206块骨头/我一生都保持了它们应有的硬度/我死后/请让它们在烈火中焚烧/请把我终生不曾曲过的灰烬/埋进笔直的树下”(《遗忘》)。这样的诗句,再次印证了女性诗人天然带有的自白气质与自画像般的精神品质,也让写作成了一种深刻的个人传记。

在广西“80后”女诗人中,陆辉艳的创作显得异常安静而又特别。这种特别,源于她在当下的生活里对过往持续的追溯与挽留,也源于她对命运那张最终底牌的清醒察觉。更重要的是,在她日常、干净、舒缓而节制的语言节奏中,那些细小、幽微、沉暗的日常事务,却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势能,呈现出寓言般的真实与命运感:“那是在夏天,我推着父亲出的轮椅/经过香樟树下/在它折断的地方/已新长出枝叶/它们还没有听到过滚雷声”(《闪电》)。她仿佛推开了日常的屏障,在寒夜中为自己铺就漫长的铁轨,必须走过寒冷、黑暗与雨水,才能维持一个人“更清醒地生活”(《简单生活》)、“可以被证实的生活”(《薄暮》)以及“理应是更加仁慈的生活”(《仁慈的生活》)。在陆辉艳缓慢如镜头推移的书写中,凝聚了如此多的阴影与尘埃。她的诗歌于平静中蕴藏着不容忽视的张力,以及反诘与悖论的光芒。诗人如同飞蛾,一次次扑向刺痛灼热的灯火,“犹如绳索之于囚笼或船渡/犹如永恒的黑暗之于人类或蜉蝣”(《条纹》)。那是在不断失去中挽留记忆、在生存困境中寻求自我救赎时必然发生的碰撞与碎裂之声。陆辉艳的诗歌让我们感受到诗意的纠正力量,也印证了诗歌作为个体主体性精神事件的正义。她揭示出现实生活与诗歌现实之间既相互关联又本质区别的关系——通过建立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诗歌现实,她为自我找到了支撑点,或一个幻梦般的入口。由此,她得以穿透经验的表层,抵达存在的内里,在语言的转折与缓冲地带,同时揭开生活的真实与虚无。

黄土路写诗已逾30年。我十分认同他的诗观:“诗人在他时间和空间里舞蹈,向下挖掘或向上飞行。当他挖掘,他是滞重的,当他飞行,他是轻盈向上的。诗人可以是一只昆虫,一条小鱼,也可以是猛兽和大

润形成了极富张力的对话。这种流动而非固化的地域性,正是广西中短篇小说一个鲜明的特征。

此外,还需看到地域性更为深刻的内在面向。在我看来,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不只体现在其所书写的内容上,那只是外在的文化特征,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在的渗透:作家身处广西,其思维方式、观照世界的方法,都会受到这片土地的文化熏染,从而在小说中折射出一种文化性格。以朱山坡的三个短篇为例:《一个夜晚,有贼来访》以平淡语气讲述远嫁北方的南方女子在冬夜遭遇窃贼;《日出日落》以第一人称作孤独的理想主义者献上一曲赞歌;《闪电击中自由女神》是一篇建立在象征与隐喻之上的复调小说,暗含对虚妄理想的祛魅,以及对更复杂的真相与和解可能性的思考。这些小说风格各异,但在构思与叙述上均体现出典型的南方特质——一种绵密、迂回、黏稠的思维质地,呼应着广西湿润、凝滞的气候与氤氲的空间感。正如朱山坡所言,他写小说是“用南方的思维方式和腔调,并尽可能转换成北方规范化语言,乐此不疲地讲述”。我认为,这正是一种内在的地域性。杨映川是位侧重心理与情感描写的作家。她对心理情感的细腻刻画,以及在观察人事时所流露的温情目光,如《尘网中的毕加索》中困顿中年男子内心未熄的艺术理想,《一千零二夜》以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抚慰两个心灵创伤者,恰恰可视为南方人宽容、坚韧性格的文学表达。

广西地处边陲,广西人常怀有一种边地意识,他们既向往中心,又自觉游离于中心之外,有时甚至会流露出某种不被规训的野性。这一特质在广西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显得尤为突出。而如何让这种边地意识绽放出文学的火光,正是广西作家乐于探索的命题。例如,田原也《第三十二层》从烂尾楼生长出荒诞的叙事肌理;《本志与本志》透露出对科幻文类的戏仿与重构。黄土路《狗失踪的那一天》表面是一则寻狗实录,内里却成为一幅现代人精神漂泊的寓言图景。这些作品皆可被视为一种自觉的、成竹在胸的“野性”,他们不把现实主义奉为僵化的戒律,也不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现代主义的足迹,一旦将边地意识从固守的土地上放飞,他们的笔触便变得自由而潇洒。由此,他们逐渐构建出一种“从边缘看中心”“从多元观一体”的独特世界观与叙事学。正是这种根植于地域又超越地域的“边地意识”,使他们得以避开同质化的叙事陷阱,揭示被遮蔽的生活本相与人生的深渊,进而对“普遍性”命题作出更具原创力的回应。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 “生活需要一个起钉器”

——广西诗歌的五个向度

□霍俊明

象。诗人在自己的世界里营构房屋、爱情甚至战争,最终又平息它们。”向下挖掘与向上飞行,构成了黄土路诗歌多年来并行的双重向度,或更准确地说,二者已融合为同一个方向——正如某位伟大诗人所言,“向上的路与向下的路实际上是同一条路”。更重要的是,黄土路的诗歌并未局限于既定的语言经验或生活经验。他始终尝试拓展语言与生活的双重边界,这使得他的写作拒绝预设与定型,而是通过不断的偶然性与生成性,激活诗歌面貌的无限可能与未知状态,从而印证了一位诗人的创造效力与内在活力。在《黑暗前传》《人与动物的交流史》等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黄土路诗歌强大的消化与包容能力。日常与未知、情感与感受、经验与超验、智性与直觉,种种元素在他笔下得以充分对话与融合。

牛依河一次次书写故乡,一次次弯腰捡拾“故乡剥离出来的碎片”,将它们重新拼贴成形。诗人曾坦言:“每一个乡愁都是不可治愈的/大地的裂缝”(《碎片》)。当精神层面的“乡愁”抒写与具体的时代背景、乡土命运以及现代性的城市话语相联结,这一写作类型便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强烈的现实感与伦理化的精神姿态。显然,诗人的“乡愁”源于城市化进程的巨大挤压及其所带来的焦虑,他也因此在诗中反复探寻不确定的命运。如果说乡村或乡愁仍具有某种精神救赎的可能,那么诗歌便成为个体最后依托的乌托邦。倘若这种向上、向后的精神向度,与真实不虚的生命体验、乡村场景以及社会伦理相互融合,矛盾之诗与焦虑之诗便同时产生——消亡的事物、紧张的时刻、挽歌与夜歌也随之必然浮现。在整体性精神的境况下,诗人只能从回忆与寻找出发,而乡土地方性知识与空间差异正逐渐消逝。可贵的是,牛依河的“乡愁”书写避免了单一向度与伦理化的简单判断。实现了对“乡村”“乡土”“乡愁”的深厚自省与复杂呈现。

以上五位广西诗人的诗歌品质具有鲜明的差异,却又都是从分层的生活现场与精神渊藪中激发而来。整体来看,诗歌更像是一把重新整理生活的起钉器,让我们目睹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彼此砥砺与博弈。

(作者系《诗刊》社副主编、编委)

对抗遗忘、守护价值是散文的重要使命。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广西作家何述强《时间之野》、冯艳冰《在目光的尽头》、黄其龙《空间:猫、硅胶工厂和心脉》、连亨《个人史与太阳鸟》、罗海《城市书:工厂生活》《个体户笔记》以及梁晓阳《文学中年》等散文作品,都以记忆为线索,或打捞乡土与时代的碎片,描摹生存与创伤过往,或以职业经历为脉络,书写转型与坚守的轨迹。它们共同勾勒出个体生存中的多元心路图景,在个性化的叙述中,刻印下时代的风云。

在个人横截面中呈现乡土生活的纵深,是这些散文的突出特色。何述强《时间之野》扎根桂西北乡土,将童年记忆与家族传承、地域文化深密交织。煤油灯下的晚自习、禾堆上的嬉闹、磨损成绳子的书包带……这些具体的童年片段,最终指向对时间的觉醒。而“十三岁”这一时间节点,犹如一记鞭响,让懵懂少年直面岁月的流逝。这种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同频共振,使记忆超越个体层面,成为文化基因的延续。何述强笔下的乡土绝非静止的怀旧图景,而是在时间之流中不断生长、隐伏的精神家园。每一块石头、每一棵老树,都承载着集体的记忆与文化的密码,也暗合对现代性冲击下文化存续的忧思。冯艳冰《在目光的尽头》聚焦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职场,呈现了时代文学生态的一个生动横截面。其中的记忆既是个人的职业印记,也是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缩影。这不仅丰富了记忆的层次,也让人经历与文学精神的传递彼此呼应。冯艳冰将个人的命运起伏、职业的坚守与文学的发展融为一体,使记忆成为连接个人与时代、传统与当下的纽带,在平淡的叙述中完成对一个时代文学精神的守望。

空间烙印着个体与生活、时代的博弈痕迹,通过对生存场域的书写来建构精神家园,构成了这些散文的另一特色。黄其龙《空间:猫、硅胶工厂和心脉》以桂江、硅胶工厂、乡村老屋为核心坐标,构筑起“乡土与城市”的多元张力。在其笔下,乡村空间更具精神重量:老屋的石磨、阳台的菜园、山间的竹鸡,这些乡土意象串联起家族记忆与情感坚守,虽老屋虽显凋敝,却承载着根深蒂固的土地情怀,与城市的商品房形成鲜明对照,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空间焦虑与情感归属由此凸显。每一个场景都烙印着生存的博弈,展现出打工者与房贷背负者的现实挣扎。连亨《个人史与太阳鸟》赋予空间书写以鲜明的创伤印记与救赎底色。开篇的码头意象——模糊的雾气与流动的河水,恰如其分地映照出主人公“来日不明”的身份迷茫,成为其个人史的起点。铁轨与工地是笔下高频出现的空间:铁轨连接着乡村与城市、过去与现在,承载着父亲的打工生涯与自身的漂泊;工地的竹架、水泥与汗水,不仅是生存的场域,更镌刻着农民工群体的艰辛与坚韧。罗海的两部作品构建了转型时代极具代表性的空间对照,完整呈现了从“单位人”到“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转型轨迹。《城市书:工厂生活》对工厂季令的书写层次分明、力道饱满——春令的云、夏令的阳光、秋令的检修、冬令的大雪,将自然时序与工业生产交织,赋予生存体验以时光流转的厚重感。《个体户笔记》细腻还原了市场经济初期个体户的生存细节:摆摊的奔波、与客户的周旋、资金周转的焦虑,以及持续的身份调适,从而记录下社会结构变革中个体的真实阵痛。

这些作品大多以真实为生命线,使个体经验变得具体可感,也拓展了散文的表达空间。何述强的文字兼具诗意与哲思,善于将家族故事、历史变迁与生命的坚韧融为一体,让哲思浸润在乡土的日常烟火中,其文本既有历史的厚重,又不失文学的灵动,做到了史中有文、文中有史。冯艳冰的作品以平实真挚见长,不事雕琢而深情自现,她多通过真实的细节来刻画人物,其质朴的风格恰与个人回忆和时代记录的主题相契合。书写中不回避命运的偶然与职业的坚守,笔墨如话家常,却在个人经历中折射出时代的变迁,让读者在共鸣中体悟文学在时间中的重量。这些作品还普遍具有鲜明的生存质感与思想锋芒,敢于直面粗粝的现实与幽暗的人性。黄其龙《空间:猫、硅胶工厂和心脉》以细腻的日常描摹展现生存的韧性。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通过具体的行为与细节,凸显母亲、祖父、岳父母等亲人在点滴中传递的温暖,这份温暖成为消解生存焦虑的底色,使作品于平淡中见深情,于困顿中显坚韧。连亨《个人史与太阳鸟》以一种带着创伤韧度的叙事,书写“左臂残缺”的身体残缺、因超生带来的身份模糊、父亲的漂泊与病痛——这些贯穿生命的创伤记忆,最终转化为自我救赎的精神养分,她的叙事由此延伸到更广阔的群体生命体验,超越个人悲欢,与一代人的记忆共鸣,笔触深情而富于力量。梁晓阳《文学中年》将写实笔触转向精神现场,深夜书桌前的辗转、面对市场诱惑时的犹豫、与同行交流后的释然……通过对内心活动的细腻刻画,展现出中年人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拉扯。文字中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却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文学在功利时代的坚守之美。

这七部作品共同指向一个精神内核:在时代与人生的变迁中,唯有守住自我的价值与精神底色,方能彰显人性的光辉与生命的韧性。在《时间之野》中,何述强通过记录乡土民俗与家族符号,唤醒了那些隐伏的记忆,以个体的书写抵抗现代性冲击下的文化遗忘。冯艳冰《在目光的尽头》以30年的文学坚守和对前辈精神的传承,使文学记忆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纽带,她从最初的懵懂向往到后来的笃定扎根,展现出文学在时间中的韧性。黄其龙在《空间:猫、硅胶工厂和心脉》中,描绘了主人公对房贷、礼金压力时的隐忍,以及母亲如喀斯特山石般的坚韧,彰显普通人在生活重压下的生存韧性。那份对生活的不放弃、对亲情的珍视,正是平凡人在困顿中发出的生命光辉。连亨《个人史与太阳鸟》在创伤中寻求救赎:病房中博士的乐观、父亲的沉默坚守,让创伤转化为成长的养分。她以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光芒,完成对自我乃至群体的精神救赎。这种坚守并非对苦难的被动承受,而是在苦难中寻找生长的力量,于创伤里重建自我的价值。罗海的两部作品更是将“坚守”贯穿于职业转型的全过程,体现出转型时代个体的精神尊严。《城市书:工厂生活》中,工人文学社的诗歌创作与摄影展的坚持,流露出工业时代工人的精神渴求。而《个体户笔记》里对诚信经营的底线守护、对自由职业的珍惜,则与工厂时期的责任担当形成内在呼应,展现出转型中不变的人格尊严。梁晓阳《文学中年》将坚守推向人生“中场”的精神层面——在功利时代坚守纯文学写作,以文学理想抵御中年的平庸。创作瓶颈时的自我怀疑、家庭责任与个人追求的拉扯、面对文学边缘化的迷茫……尽管如此,他依然在琐碎日常中坚持阅读与书写,在功利浪潮中守护精神的净土,呈现出中年群体在人生中途的精神求索与人格力量。

总之,这些散文作品风格各异,却都以多元的叙事,勾勒出当代个体从乡土到城市、从个体到集体、从青年到中年的生存与精神轨迹。它们记录转型时期的适应与坚守,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忠实书写,让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坚守求索得以被看见、被铭记。这些时代精神的生动切片,最终鼓舞着我们:保持对人性的根本坚守,持续对生命意义的真诚探寻。

(作者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 个体叙事中的时代印记

——广西散文作品简评

□梁鸿鹰